

纪念延安双拥运动八十周年——

双拥之花 更加绚烂

双拥运动兴起

双拥运动早在大革命时期便已萌芽。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毛泽东发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文，首次提出“军民一致”原则，随后将其确定为八路军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之一。同年，边区政府颁布《抗日军人优待条例》《关于拥护和扩大八路军的决议》等文件，双拥工作由此日渐制度化、体系化。

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为进一步密切军政、军民关系，夺取对敌斗争的胜利，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分别在军队和地方开展一次“拥护政府，爱护人民”和“拥护军队”的运动。1943年1月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了《拥护军队的决定》，确定1月25日至2月25日为全边区拥军运动月。25日，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司令部和政治部联合作出《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同

日，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政治部又发出《关于拥政爱民运动月的工作指令》，规定2月5日至3月4日为全边区部队拥政爱民运动月。2月1日，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公布《拥政爱民公约》十条，这也是人民军队第一个拥政爱民公约。在军地双方相互推动和配合下，拥政爱民、拥军优属运动在陕甘宁边区轰轰烈烈地展开。

在拥军优属运动中，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及人民群众对当地驻军及部队中的伤病员、残疾人员、抗日军人家属普遍进行了走访慰问，送去春联、粮食等物品及部分现金，并与驻军举行多种形式的联欢活动。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同志，率领慰问团到南泥湾慰问第359旅的指战员。一些地方干部还进行了拥军工作的反省和自我批评。

在拥政爱民运动中，八路军留守兵团等驻陕甘宁边区部队，采取召开干部会议和军人大会的形式，在全体指战员中进行拥政爱民教育，进一步提高了尊重政府和爱护人民的意识。同时，广泛开展登记旧案工作，发现有损害政府和群众利益的行为，坚决予以赔偿、退还、道歉。通过举行多种联欢活动，增进了与人民群众的感情。

双拥运动极大地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使边区军民达到空前的团结，有效保障了对敌斗争与生产运动的胜利。1943年5月8日，《解放日报》发表《拥军运动和拥政爱民运动的经验》社论，充分肯定了陕甘宁边区军民开展双拥运动的重大成绩和成功经验，号召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学习借鉴。10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明确指出“各根据地党委和军政领导机关，应准备于明年阴历正月普遍地、无例外地举行一次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广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以后应于每年正月普遍举行一次”。自此，双拥运动在各根据地逐步开展起来，并成为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

赓续双拥传统

解放战争时期，双拥运动进一步发扬光大，展示出巨大威力。1947年10月10日，解放军总部发布《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使全军有了统一的纪律和行为规范。此后，各部队先后进行政策纪律教育，许多单位还推出遵纪爱民公约，个人制订了遵纪爱民计划，并将贯彻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情况列入立功运动，定期进行检查，开展表扬和批评。这些举措极大增强了干部战士的群众观念和政策纪律观念，提高了执行政策的自觉性，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

广大群众以各种方式支援解放战争，出现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入伍的动人场面。上党战役打响后，太岳地区人民群众用实际行动响应“紧急动员青壮年参军入伍”的号召，掀起解放战争的第一次大规模参军热潮。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中，支前民工就达886万人，出动担架36万余副，大小车100余万辆，牲畜200余万头，输送粮食64万吨。从抗日战争“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到解放战争“潮涌般的小推车和担架队”，双拥工作都深刻揭示出“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战争法则。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1月27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成立，其中优抚司主管拥军优属工作。1950年12月22日，内务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联合发出《关于新旧年关开展拥政爱民和拥军优属运动的指示》，之后的每年元旦、春节期间，全国军地主管部门都要组织开展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活动。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根据中共中央发出的一系列指示，全国开展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运动。全国人民以实际行动热情地投入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其中包括：各族人民、社会各界募集慰问品、慰问金，写信慰问信，组织各种慰问团赴朝鲜战场前线阵地慰问志愿军。各级人民政府和全社会优待军烈属。全国掀起参军、参战、支前的热潮。大批铁路员工、汽车司机和医务人员，志愿到炮火连天的朝鲜战场担负战地勤务和运输工作。全国各地分批将饼干及肉、蛋、蔬菜等制成品送往前方……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离不开军民团结的巨大力量，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为新中国赢得了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据《学习时报》）



1943年3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左一）率领边区党政慰问团慰问南泥湾驻军。

春耕时节 古人这样种田

近日，全国各地陆续进入春耕时间。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季是农业发展最关键的时期。那么，你知道在古代中国，由谁来传达春耕的信号吗？春耕期间有哪些独特的习俗？历史上，农业耕种技术经历了怎样的发展？

「耕」是一年之计的开端

“春耕”的说法最早见于《列子》，后在《荀子·王制篇》中加入了対自然规律的进一步总结，有：“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春耕指的是在春季，通过犁、耙、耖等工具対土壤进行耕作的农事活动，具有季节性强、时间窗口期短等特点。

“耕”是一年之计的开端，垦耕之后将对土地进行耙劳、播种、锄治、粪壤、灌溉，完成这些后，收获时间就到了。成语“一年之计在于春”最早出现在唐代农书《四时纂要》中，讲的就是春耕的重要性。

耕地其实就是对土地进行“翻新”，将耕作层上面的土壤翻到下面，又将下面的土壤带到表层，根据犁铧大小与时节的变化，深度一般为18—22厘米。明代马一龙的《农说》中提到“农家栽禾启土，九寸为深”，具体说明了耕地的深度。

春耕的主要任务则是为禾苗创造一个舒适的环境，从而提高产量。《汜胜之书》中有：“凡耕之本，在于适时、和土、务粪泽、早锄早获。春冻解，地气始通，土一和解。”因此，春耕之际，农民们也格外忙碌，清代的《耕田歌》中就说：“春已至，农事始，鸡未鸣，耕者起。”

古时，“春耕”等农业活动主要依据二十四节气。后来，还发展出了“春官”这一职位。相传最早的春官叫“知春官”，由唐太宗李世民设立，主要工作是口述二十四节气的来历及含义，提醒老百姓每个月该如何进行农事生产。

民间的“春官”则以送“春帖”为主，说唱节气风俗为辅，由古代官方春官演变而来，拥有丰富多彩的春官歌曲库。据说，春官崇拜的祖师是远古主管农业的“三皇爷”，他骑在牛背上，到各地传播二十四节气知识，指导老百姓种田。



立春之后，“开耕试犁”是部分地区传承至今的春耕习俗之一。在山东海阳，人们会先拜犁具，并唱喜歌：“犁破新春土，牛踩丰收亩，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然后牵牛到田间象征性地耕一耕。

在古代，耕牛对于农业生产具有重要意义，因此，部分地区也有“打春牛”的习俗，“春打六九头，七九、八九就使牛”，讲的就是古人在春耕前鞭打用土制成的耕牛。这一习俗源于先秦，唐、宋以后盛行，宋仁宗颁布《土牛经》后，打春牛风俗便流传得更广。

育种插秧时，人们也有特别的仪式。例如，在育种时，放上红纸，压上镰刀，据说既可“催芽”，还能镇邪。而在插秧时，点三炷香就能请来“秧神”保护秧苗茁壮成长。

不只是百姓，皇室成员们也十分重视春耕，甚至需要在固定的日期亲自下田种地。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到，二月初二，周武王会举行规模盛大的仪式，并亲自带领满朝文武百官耕田劳作。

汉朝十分重视春耕。在汉朝的史书中，每一位皇帝下地种田的事迹都记载得十分精确。当时，在贾谊的劝说下，汉文帝在城外进行“亲耕”，引起了百姓的围观，场面颇为宏大。自此，春耕便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流传下来，为后世沿用。

唐代开始，二月初二被正式定为“耕事节”或“劳农节”。皇帝率百官出宫到田里耕地、松土，象征性地参加劳动。

明清时期，皇帝的亲耕活动通常在2月—3月择吉日进行。为了避免生疏，皇帝一般会先到西苑丰泽园进行练习。正式亲耕之日再前往北京城南的先农坛，先进行祭拜仪式，再扶耒耜牛，扶犁耕播，在鼓乐赞歌中往返三次，完成“三推三返”的亲耕礼。康熙帝在其诗作《春雪》中就记载了亲耕的经历：“三冬望雪意殷殷，积素春来乱玉纹。农事东畴堪播植，勤民方不愧为君。”

从农耕走向未来

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中国就出现了原始农业的雏形。人类采用简陋的石器、棍棒等生产工具从事着简单、粗放的农事活动，其代表的耕作方式就是“刀耕火种”。

但直到农具耒耜的产生，真正意义上的“耕”开始出现，“刀耕火种”式的生产方式才逐渐被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所取代。

这一时期，犁、耙、耖成为农民们最普遍使用的农业工具。

其中，犁主要用来破碎土块并耕出槽沟，从而为播种做好准备。中国的犁是由耒耜发展演变而成，用牛牵拉耒耜以后，才逐渐使犁与耒耜分开，有了“犁”的专名。

耙则主要用于平整土地，古人将耙齿设计得下面朝后弯曲，可大大减少土地的阻力。耙在中国已有1500年以上的历史。北魏贾思勰著《齐民要术》也称之为“铁齿耨”。

耖的形状则和耙相似，是疏通田泥的农具，可借助牛的拉力，将高处泥土拉运到低洼的地方，从而使田面平整。《农书·农器图谱》载：“高可三尺许，广可四尺。上有横柄，下有列齿，以两手按之，前用奋力挽行。”

汉唐时期，农业生产工具不断发展，曲辕犁、筒车等农具的出现使农业生产力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宋以后，农业技术得到推广和普及。宋太宗时期诞生了最早的农技人员——“农师”。元代时，通过编辑、印刷农事资料来指导农民种植和养殖成为常态。明朝皇帝朱元璋曾将农学家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印发推广至全国。当时，“劝课农桑”也作为地方官员考核的重要内容。农技与农机的结合，让农耕文明进一步焕发光彩。

新中国成立后，农业渐进到现代农业发展阶段，其最突出的标志之一就是耕作的机械化。以拖拉机为动力，牵引犁耙等工具资源，提高作物产量。

今天，现代科技对农业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履带自走式旋耕机、印刷播种技术、智能水肥一体化灌溉设备……农民春耕也有了越来越多的“神器”。（据《咸宁日报》）

读史忆人

典故

鲁迅与曹靖华的情谊

1925年春，与曹靖华同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工作的苏联顾问团成员王希礼翻译了鲁迅的《阿Q正传》，把初稿给曹靖华过目。曹靖华把译稿中难解的问题汇集起来，给鲁迅写了封信求救，信中还请求鲁迅给俄译本写序、自传并附上近照。收到信的第二天，鲁迅就给他回了信，除了回答问题之外，还满足了他提出的所有要求。1929年《阿Q正传》俄译本在列宁格勒出版。据1925年5月到1936年10月的《鲁迅日记》记录，鲁迅总共给曹靖华写过292封信，由此可见两人之间的深厚情谊。1930年，鲁迅写信给在苏联学习的曹靖华，想请他翻译《铁流》。当曹靖华冒着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译完寄回后，国内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原先约定的书商不敢出版此书了。鲁迅重诺守信，亲自校订《铁流》并作后记，然后假托一个并不存在的“三闲书屋”自费印了《铁流》《毁灭》等书。书印出后遭当局查禁，鲁迅又委托内山书店将书放在柜台下面，想方设法把这1000册书悄悄送到喜欢它的读者手里。

鲁迅此生最后一封信，是在他逝世前两天（1936年10月17日）写给曹靖华的。信中写道：“此病虽纠缠，但在我之年龄已不危险，终当有可痊之一日，请勿念为要。兄之小说集已在排印，二十以前可校了。”鲁迅去世后的第二天，在北京教书的曹靖华接到此信，读后不禁潸然泪下。信中提到“兄之小说集”就是他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为出版这本书，鲁迅拖着病体奔走了两个多月，多次给责任编辑写信，去世前两天还为此书作了序言，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关心这位弟子与好友。

（据《联谊报》）

拾遗

徐光启种好红薯再当官

1610年，在家丁忧期满的徐光启接到吏部要求其回京复职的文书，徐光启回复说“薯种越冬春耕事未完，容春后北返”，意思是贮存好红薯，春天播种后再回北京做官。

红薯在明朝中期引入中国，最大的特点是产量高，可种植范围一直局限在岭南一带，没有在国内大面积推广。除了信息不通交通闭塞的原因，红薯本身也有一个缺陷，就是贮藏不易，过冬的红薯不是烂掉，就是提前发芽。丁忧三年的徐光启一直在家试验，一定要解决贮藏这个难题。

徐光启把红薯分成几组，分别藏于阁楼、草垛、墙洞等地方，但到春天拿出来，基本上是烂掉的。有一年，他突发奇想用旧棉把被红薯包裹着，结果没挨过冬天，红薯烂得更快。到了第三年，徐光启在自家院子里挖了几个土坑，底下分别垫上稻草、树枝、草木灰等，把红薯种放进去后，有的土坑上方插上透气的竹筒，有的土坑则密封起来。徐光启不去复职，就是等待试验的结果。

到了春天，那些密不透风的土坑让徐光启欣喜不已，每个出土的红薯都完好如初，他记录如下文字：选择高土，薯入地窖，秘藏过冬，开春如新。之后，徐光启在全国大力推广这种贮藏方法，红薯得以大面积种植，很好地解决了当时中国因人口大增而出现的粮食问题。（据《天津日报》）

“许真人”为一字较真

1920年，许地山先生进入燕京大学宗学院学习梵文，他行为古怪，反应迟钝，每日总穿下摆带毛边的灰布大褂，不理发，头发长过耳，吃窝头不就菜而是蘸糖，再加上紫红面孔，嘴巴虽老张开却总是郁郁寡欢、独来独往，被同学们视为怪人，并称其“傻子”，还赠以雅号“许真人”。

相处时间长了，同学们这才发现，许地山不仅懂多国文字、会多种方言，而且爱较真。当时，冰心担任《燕京大学季刊》编辑副主任，一次，冰心收到许地山寄来的一篇文章，文中有“雇工”二字，冰心编辑时，顺手在“雇”字左边加了个“f”，偏旁，成了“僱工”。

几天后，许地山给冰心写了一封近两千字的长信，引经据典证明古代的“雇”字没有立人旁，“是你自作主张改错了，需要更正一下，否则会以讹传讹”。冰心看了信后，因手头事多就没有理会。

岂料几天后，冰心又收到许地山的一封信，对证明冰心改错“雇”字又补充了很多材料，并“威胁”道：“你如果不认真对待此事，我定然是会找上门去，与你好好理论一番的。”这回冰心再也不敢怠慢许真人了，立即放下手头的事，给许地山回信道：“我真的服你了，你说得对，是我错了，请你别再寄材料了。”并在下期刊物上对错字纠正的同时，又做了诚挚道歉，许地山这才作罢。

从此，冰心一旦收到许地山的稿子，再也不敢轻易修改了，两人还因此成了好朋友。（据《联谊报》）

米开朗琪罗不称职的“兼职快递员”

米开朗琪罗生活的意大利，各城邦之间外交与商贸频繁。不过由于各城邦之间路途遥远，雇用信使是一笔不小的支出。16世纪初，雇用信使将物品从佛罗伦萨送到罗马，其佣金大约是给每个家庭一个月的收入。许多名人都曾当过“兼职快递员”，顺路帮人寄送书信和礼物。

1506年，米开朗琪罗从佛罗伦萨前往罗马拜见教皇，临行前就接了一单，客户是因《君主论》而名传后世的马基雅维利。当时，马基雅维利在罗马出差，需要一笔经费，政府同事得知米开朗琪罗的行程，就请他捎钱捎信。结果，米开朗琪罗到了罗马与教皇因艺术分歧大吵一架，居然忘了望眼欲穿的客户。等他回过神来时，已经离开了罗马，只能把钱和信退给了佛罗伦萨政府，留下身后的马基雅维利徒呼奈何。（据《天津日报》）